

# 火热的“环保心”何以欠下糊涂的“环保债”

田桂荣“执迷”环保20年，掏空腰包还欠债85万元，警示做公益也是门“技术活儿”

“

“执迷”环保20年，田桂荣缺钱总是从自己口袋掏，没钱就向亲朋好友借，再不然就找银行贷款。田桂荣和儿女算了一下欠账数额，发现共欠下85万余元的债务

田大妈是“环保斗士”，凭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思路“冲锋陷阵”，不过，现在需要的是“环保卫士”，按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做环保

本报记者李钧德、韩朝阳、李文哲

20年前，河南省新乡市个体工商户田桂荣因自费20多万元回收60多吨废旧电池，引发社会对废旧电池危害的关注，成为民间环保先行者和“环保明星”，并在新乡市成立中国首个农民环保组织——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带领环保志愿者，从事保护母亲河（黄河）污染调查等环保公益活动。

如今，68岁的田桂荣病了，下肢静脉曲张、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让曾经意气风发的“民间环保大使”身体佝偻，再也没有了高举奥运火炬奔跑的风采。

疾病摧残着田桂荣的身体，债务却要压垮她的脊梁。没有可靠经济来源的田桂荣“拆东墙，补西墙”做了近20年公益环保活动，累计欠债85万余元。虽然有着火热的“环保心”，却欠下巨额“糊涂账”，这也反映出民间公益组织在理念、管理、财务上存在短板的“通病”。

## 环保先行者田桂荣发出SOS信号

“执迷”环保20年，田桂荣缺钱总是从自己口袋掏，20年来，她掏空了自己的腰包，掏空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一屁股债

记者在出租屋见到田桂荣时，她身穿青花色棉袄，暗红色旧皮靴，坐在椅子上，脚腕处露出深紫色的毛线裤。屋里没暖气，她将双手插在腋下，身体缩在毯子里，尽管精神不错，但整个人很是瘦弱。

2018年是田桂荣最艰难的一年。银行打电话催欠款，借钱给她的老志愿者们要她还钱，她甚至因欠债被起诉至法院。“躲”在出租屋里，田桂荣不敢接听电话，怕催债。“一打电话就说要我还钱，我肯定不还，就是暂时还不起。”田桂荣说。

“肯定还钱”是田桂荣不断重复的话，“还不起”是她面临的最大危机。

“执迷”环保20年，田桂荣缺钱总是从自己口袋掏，没钱就向亲朋好友借，再不然就找银行贷款。20年来，她掏空了自己的腰包，掏空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一屁股债。田桂荣说，自己的两张信用卡欠了近7万块钱，家人的4张信用卡欠了十多万块钱，建生态园欠老志愿者和亲戚朋友30多万元，这些是她欠债的大头。

田桂荣曾想建生态园“挣钱搞环保”，但她没想到2010年建起的生态园成为沉重的“包袱”。生态园面积最大时有近百亩，由于不会管理，最红火的时候一年才挣1万多块钱，而田桂荣累计投入40多万元，这些钱都是老志愿者们凑出来的。

2016年12月，在环保志愿者张洁的提议下，田桂荣和儿女算了一下欠账数额，发现共欠下85万余元的债务。“根本不知道她欠了这么多钱，原来以为可能只欠一二十万。”田桂荣的儿子小范说，“我就不该给她信用卡，有时候她着急用钱，看起来都活不下去了，我就把信用卡给她，现在真后悔。”

面对债务，田桂荣总说“还钱不是个事”，但如何还债，她也没谱。“生态园还有3000棵树木，能卖10万块钱左右，生态园旁边的河堤要扩建，占地有补偿。”田桂荣反复提及的经济来源唯有这两项。“补偿还是没影的事，杨树现在根本卖不上价。”田桂荣的家人说，“现在生态园近30亩地，每年租金就得两三万块钱，她连租金都交不起。”

2018年12月，一位销售电动汽车的老板给了田桂荣1000块钱，让她调养身体，说以后要请她做形象代言，田桂荣高兴坏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半个月后，急缺钱的田桂荣开口问该老板借1万块钱，却以“工人发工资紧张”为由被婉拒，但她仍将之前的许诺当作“一个好消息”。

现在真正靠得住的是田桂荣的丈夫老范的工资，72岁的老范干一份看大门的工作，一个月挣1800块钱，每一分钱都舍不得花，都给了田桂荣还账。“老范是幕后英雄，下辈子还找老范。”谈起老范，要强的田桂荣难得显露内心的柔软。

2015年，田桂荣重病住院，她开始反思，为了还债，她试图卖房、卖火炬，当时家人极力反对。“说实话，农村的房子能卖多少钱？火炬更没谱。”当时有家属说了句不好听的话，“你去世了，在哪办丧事？”田桂荣由此打消了卖房的念头。

如今，家人实在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我妈总说天无绝人之路，但路真的会被走绝的，我每天做梦都替她发愁。”小范说，“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人来帮忙把火炬卖了，把房子卖了，把火



▲田桂荣为“挣钱搞环保”建的生态园（2018年12月26日摄）。

▲田桂荣指着墙上的宣传图片介绍自己的事迹（2018年12月26日摄）。

▲曾经的环保横幅被挂在鸡舍上做围挡（2018年12月26日摄）。

本组照片摄影记者韩朝阳



炬卖了，只要能通过合法途径还钱，卖一点是一点。”

## 火热的“环保心”，糊涂的“环保账”

85万余元的债务已无法理清，田桂荣只是肯定大部分用于做环保和建生态园

站在生态园里，田桂荣用略显拗口的普通话大声喊着活动板房上的标语：“环保事业是最无私的人所从事的最无私的事业，需要更多无私的人做出更多无私的奉献。”田桂荣为大学生做过多场演讲，“不管去哪演讲，能叫学生哭，能叫学生笑。”对此，田桂荣颇为自得。

事实上，作为中国第一代“公益环保人”，自费20余万元回收废旧电池、带领大学生沿黄河做水污染调查、开展各类环保宣传活动……田桂荣的确影响过一批人，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她说起一串人名，长垣县保护濒危鸟类的宋克明、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吴胜、做环保做得“最优秀”的徒弟田静……“我到新乡的医院、银行，很多工作人员都说听过我的演讲。”田桂荣说，“我的事迹还被编入中小学生的德育读本。”

田桂荣一度获得诸多荣誉，第二届全国“母亲河奖”、全国三八红旗手、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福特国际环保奖等等，2008年她还当过奥运火炬手，但光环之下却是背负“巨债”的巨大反差。

小范说：“最初我妈回收废旧电池，觉得是好事，当时家里做生意，有点积蓄，她愿意做就做了，大不了把家里的积蓄花光，没想到她越陷越深。”

光环也曾给田桂荣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得过保护母亲河奖2万块钱，阿拉善生态基金会给过2万块钱。”田桂荣已记不清奖励或捐助明细，“大概有10多万块钱。”

田桂荣说：“有一位教授评价我，说我起了一个杠杆作用，撬动了民间环保事业。”她夸自己“最优秀”的徒弟田静是公益环保圈的“王”，但觉得“我比田静干得多”。

“田大妈说话比较夸张。”2013年入行的田静在北京一家公益环保机构工作，“2013年我加入田大妈的环保志愿者队伍时，她的经济状况就不好，靠借贷维持。她不会管理，很多人都劝过她，说她年纪大了，别再待在环保一线，她不愿意承认或听不进去。”

田桂荣总“冲”在公益环保第一线，但因管理和理念的欠缺，积累了一摞糊涂的“环保账”。85万余元的债务已无法理清，田桂荣只是肯定大部分用于做环保和建生态园。提议清算账目的张洁说：“账本我看过，只有人名、欠债金额以及借款时间，至于用途，我也不清楚。”当时动手算账的小范说：“有90%左右用在环保和生态园上，用于看病或还债的只占很少一部分。”

处境窘迫的田桂荣似乎有点盲目乐观，“我相信欠的窟窿一定能补上。”小范觉得家里处境艰难，“那不是一两万块钱，我们经常为还钱的事吵架，被逼到气头上，小范甚至有断绝母子关系的冲动。

田桂荣身上暴露的问题本应有一道监管防线。2015年12月，田桂荣曾是新乡市环境保护志

愿者协会会长，其业务主管部门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原新乡市环保局）每年要对业务和财务进行年审。但在财务上，田桂荣说协会的账上基本没钱，“都是自己往里垫钱，让审核通过”。

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原新乡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年审仅仅是走一道程序。”至于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究竟该怎么管，该负责人也说不清楚。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原新乡市环保局）副局长唐金江解释，局里现在只有38个在编人员，环保工作压力很大，对志愿者组织的管理确实跟不上。

2015年当选为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会长的王军说，协会注册、存续都需要有一定资金，但我接手的时候账上一分钱都没有，也是自己垫点钱，让账上看起来有点钱，但那是我自己的钱。

当地政府和一些公益组织也曾对田桂荣伸出援手，帮她卖树苗、众筹医疗费，但田桂荣糊涂的“环保账”至今算不清，也还不上。

## 把脉环保“病人”，看似“糊涂”实为“通病”

田桂荣凭着一腔热血做好事，这样走不远，公益组织也需要战略、管理、募资，这些都需要有监管、专业化

“以前我们协会的官网叫‘田桂荣环保网’，上面都是她的头像，我把网站完全改版，这个是大家的平台。”王军和田桂荣理念不同，“我觉得做环保要量力而行，她走向极端了，最后陷在里边出不来了。”

没人否认田桂荣对环保的热情和投入，尽管不认同田桂荣的做法，王军仍肯定田桂荣的付出。“在公益环保上，她确实干得多了，获得很多荣誉，我没法跟她比。”王军说，“我觉得不同时代对环保组织和志愿者有不同的要求，她需要转型。”

实际上，田桂荣的“粉丝”和徒弟已经开始新的选择。

吴胜是田桂荣的第一批环保宣传对象，也是田桂荣的“粉丝”，他还是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副会长。“背景不一样，20年前很少有人意识到环保重要，需要田大妈这样的人站出来。”吴胜说，“现在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作为志愿者，要身体力行，带领大家自觉环保，公益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点点滴滴。”

谈及田桂荣的债务，吴胜说：“不是因为做环保就盲目，干啥事都要有团队精神，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田大妈缺一个管家，她做精神导师可以，但理念和管理上还是落后了。”

“我觉得必须有资金保障才能做公益，像田大妈这样凭自己的热情，从家里拿钱做环保，如果是我，我做不出来，这也是一种专业和长久的做事方式，自己和周边的人都会很痛苦。”田静说。

田桂荣说自己搞环保调查就像做“特务”一样，“偷偷摸摸”的，但田静和吴胜已利用各种渠道和职能部门，调查对象协商沟通。田静说：“社会大环境不一样，我们和职能部门的目標是一致的，以前有刻板印象，觉得环保组织就是给环保部门找

麻烦，现在职能部门能理解我们。”

田桂荣曾是新乡市，乃至中国公益环保的一面旗帜，至今当地环保部门仍认可田桂荣等环保志愿者为环保事业做出的贡献。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原新乡市环保局）副局长唐金江表示，希望环保组织能发挥“桥梁”作用，利用凝聚的社会资源，发现问题后及时跟环保部门沟通，把先进的环保理念和技术传递给公众和企业。

“她这一代民间环保人已经完成了使命。”田静说。实际上，2015年生大病后，田桂荣已经在家人的劝说下逐渐淡出“环保圈”，68岁的老人确实有些跟不上飞速发展时代，她还拥有对环保的热情，但也背负了沉重的“环保债”。

田桂荣仍坚持“以后有钱了，我要继续做环保”，小范却希望母亲的经验能够警醒他人，做公益一定要“顺其自然，量力而行”。

田桂荣管理中暴露出的问题看似“糊涂”，实为公益组织容易犯的“通病”。田桂荣本人没有管理公益组织的经验，也没有使用专业的人才，她凭着一腔热血做好事，这样走不远，她现在的窘迫就是走不远的表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田桂荣在理念、管理、财务上存在的问题并非个例，公益组织也需要战略、管理、募资，这些都需要有监管、专业化。

田桂荣曾想建一个生态农庄，老范当“村支书”，自己当“村长”，过上安静的生活，但这似乎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在生态园的板房内，记录田桂荣事迹和荣誉的展板挂满了墙壁，但寂寥的生态园里回荡的也只有她朗读标语的声音：“环保事业是最无私的人所从事的最无私的事业……”

## 亟待关注的社会公益组织和“领路人”

政府要引导公益组织搭建专业平台，完善治理机制，鼓励公益组织联合起来建立标准，提升其专业能力

目前，全国社会组织的登记数量超过81.6万个。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社会组织近10年来蓬勃发展，在数量规模、资源量级、志愿参与、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重大进展。

不过，社会组织的规范监管和能力建设却面临严峻挑战。田桂荣的“徒弟”吴胜说，田大妈是“环保斗士”，凭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思路“冲锋陷阵”，不过，现在需要的是“环保卫士”，按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做环保。

田桂荣在理念、管理、财务等方面暴露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公益组织容易犯的“通病”。2017年，刷爆朋友圈的“一元购画”“同一天生日”被质疑存在虚假信息；2018年，公益项目黑土麦田及其联合创始人秦玥飞被质疑在项目业绩、管理、财务、个人作风等方面存在问题。

对此，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社会组织）主任

马军认为，监督和规范必不可少，“公益组织需要构建一套规范机制，要有内部规范，也要有外部监督。”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公益组织的指导和监管。“主要是指导不足，培训和服务不够。”王振耀说，政府要引导公益组织搭建专业平台，完善治理机制，鼓励公益组织联合起来建立标准，提升其专业能力。

王名认为，当前社会组织暴露出的“通病”说明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已发生变化。以前，社会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制度约束和资源约束，近年来，政策法规逐步完善，政府对社会组织支持的格局基本形成，社会捐赠已形成规模，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大，但是，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力专属性不足。

“田桂荣的事情是典型案例，公益组织最大的问题就是凭着一股热情做好事，不注意自身的专业化。”王振耀说，“公益组织要通过自己的专业化，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田桂荣的“徒弟”田静称自己为公益环保从业者。“田大妈将环保志愿者这个角色道德化了，它其实跟其他行业一样，也需要职业化、专业化，也需要资金支持。”田静说，“向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公益环保才能走得更远。”

王名解释，一般而言，社会组织的能力专属性较高，其在特定领域的专业化程度就高，竞争力就强，政府才愿意与其开展合作，其在特定领域就能实现深耕，团队的专业能力就能稳步提高。

为促进社会组织的专业化，王名说，一是要从体制和政策上加大对公益组织的支持力度，把培育公益组织的能力专属性作为推进社会组织深化改革的重要政策目标；二是建立教育培训及人才培养体系；三是改进社会组织的考核评估机制，建立和完善基于能力专属性的评估体系。

马军对此表示认同，“很多公益组织凭借公益捐助和志愿精神提供社会服务，但是因为资源和能力有限，服务质量一般，难以通过服务获得收入。在公益筹款比较艰难的情况下，很多公益组织只能捉襟见肘‘做公益’，其服务质量难以提升，形不成良性循环。”

公益组织发展的核心在人才。“公益组织在招收专业人才上处于弱势，很多人不理解社会组织的发展前景，甚至不认同这是一个职业。”马军说，解决这个问题，需改善社会组织整体生态，既要让公众认识到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需要政府部门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同时，社会组织要提升自身的管理、服务水平。

台湾辅仁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徐博闻毕业后于2010年进入公益行业，他说：“很多人对公益组织的印象要么是很好，要么是很差，但我相信越来越多专业的人带头干专业的事，公益组织会取得好的发展。”

社会组织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要补充，但面对理念、财务、管理、人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面对公众对公益组织的不解和质疑，面对专业化不足的缺陷，公益组织的发展依旧“任重道远”。